

史前三大考古文化區的交匯 與中國文明起源

郭大順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名譽所長

提 要

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匯，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個原動力。其中尤以使用彩陶、尖底瓶的中原粟作農業區、使用陶鼎、豆、壺的東南稻作農業區和使用筒形陶罐的東北漁獵區這三大區的南北和東西交匯所起作用最大。它們又可以距今五千年為界分為各大區「個性化」突出又頻繁交匯的「仰韶時代」和文化共同體最初形成的「龍山時代」。南北交匯在燕山以北產生的壇、廟、塚和東西交匯在豫西地區產生的鼎、豆、壺組合，都已具傳統的禮制性質。其所反映的以燕山南北、東南沿海向中原匯聚為主導方向的文化互動路線及其所實現的「文化認同」，與古史傳說中五帝諸代表人物的活動軌跡相吻合，也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現奠了基。

關鍵詞：三大區、文化交匯、文明起源、五帝時代

隨著中國文明起源討論的深入，更重視對文明起源機制的研究。¹其中，文化交匯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這主要表現為三大考古文化區的交匯。

一、並行交匯的三大考古文化區

三大區的劃分是在考古學文化區系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從經濟類型和考古文化特徵的基本區別方面提出來的。

較早從經濟類型的差別提出三大區劃分的有日本中國考古學研究會的秋山進午和熊本大學的甲元真之。秋山進午將中國新石器時代劃分為華北黃河流域的雜谷文化地帶，華中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地帶和東北地區的狩獵、漁撈地帶；甲元真之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劃分為三種經濟類型：以稻作和漁獵、狩獵為主兼有其他生產活動的長江流域，以粟作農業為主，兼營多種雜穀，輔以多種家畜飼養和狩獵等經濟活動的黃河流域，以狩獵、漁獵、採集等自然經濟為基礎兼有多種雜穀栽培和輔以家畜飼養的東北亞地區。²考古學者則著重從區域考古文化特徵劃分三大文化區。1987年在山東煙臺召開的第一次環渤海考古學術討論會上，張江凱在發言中將山東、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統稱為「鼎文化圈」；林沅和他的學生馮恩學以新石器時代筒形罐為主要文化特徵劃分出東北文化區；³嚴文明於1993年在內蒙古赤峰市召開的「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將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北系統稱為鬲文化系統，將以長江中下游為主體的東南系統稱為鼎文化系統，將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東北系統稱為罐文化系統；1994年他在日本九州大學的講演中，又將華北稱為鼎鬲文化圈，將華中稱為釜文化圈，將東北稱為罐文化圈；⁴筆者在199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主辦的「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

1 張光直先生在陳星燦所著《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序》中說：「為什麼近十年來的學者對『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這個問題僅僅限制在『中國文明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問題上來理解？為什麼不討論文明前的社會產生文明的內部的動力的問題？」頁1-5。

2 a 秋山進午，〈東北地區の新石器文化〉，頁13-35。

b 甲元真之，〈長江と黄河——中國初期農耕文化的の比較研究〉，頁108-114。

c 岡村秀典，〈農耕社會與文明的形成〉，頁85-97。

3 a 《林沅學術論文集》，頁8。

b 馮恩學，〈東北平底筒形罐區系研究〉，頁28-42。

4 a 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提要）〉，頁17-18。

b 秋山進午，〈阜新查海遺址與遺址博物館〉，頁342。

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也提出過「以筒形罐為主要特徵的北方區、以鼎為主要特徵的東南沿海區和以盆鉢罐為主要特徵的中原區。」⁵這裡還要特別提到的是，從史前玉器區域特徵和玉料產地得出的史前玉器分區也有相對應的研究成果，如1995年鄧淑蘋提出史前玉器三源論，即是將史前玉器劃分為華西、華東的北部、華東的南部至華中的三大區。⁶

根據目前的認識，對這三大區較為準確的表述可為：以彩陶、尖底瓶——鬲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原文化區，以鼎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以筒形陶罐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東北文化區（圖1）。

三大區劃分的意義還在於大區發展階段的同步性以及與此相互關連的區間文化交匯。這在三大考古文化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一些代表性文化之間，即中原區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諸類型，東南區的大汶口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環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東北區的紅山文化與小河沿文化，都有集中體現。如這一時期各大區不僅發展序列有很強的同步性，而且具有因文化交匯而形成相近的階段發展規律。同步性表現為都可以大約距今五千年為界，將各大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劃分為相互對應的兩大階段；相近的發展規律表現為，前一階段是各大區「個性化」突出又頻繁交匯的時期，後一階段則是在文化交匯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實現文化共同體最初形成的時期。⁷前一階段張忠培稱為「仰韶時代」，後一階段即嚴文明首先提出的「龍山時代」。⁸

二、南北、東西之交匯導向與文明火花的產生

區間文化交匯作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隨著這一理論的不斷充實和發展，特別是隨著由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導致文明起源討論而有較多論及。蘇秉琦在正式提出六大考古文化區系之初，就從強調「這六個地區

5 郭大順，〈文化交匯與中國早期國家〉（未發表）。

6 鄧淑蘋，〈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頁44-58。

7 蘇秉琦，〈再談籌建考古實驗站與課題問題——給山東省文物局負責人的一封信〉，頁171。

8 a 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過渡〉，頁1-44。

b 嚴文明，〈龍山文化與龍山時代〉，頁41-48。

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爐的作用」的角度來探索中華民族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在文明起源討論中，他又提出「裂變」、「撞擊」、「融合」等多種區內與區間文化交匯形式產生的「文明火花」是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催化劑」。⁹張光直更直接從考古區域文化的發展和擴張形成的「相互作用圈」或「文化網」來劃分考古文化區並探索文明的形成：「從每一個區域文化個別的觀點來說，外面的作用網和兩千年間在內部所發生的變化，在這個區域史到西元前第三千紀之末之準備向國家、城市 and 文明跨進的準備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¹⁰許倬雲引伸英國歷史學家A·湯恩比著名的「挑戰與應戰」的文明起源觀，提出在「接觸、衝突、交流、適應、整合」模式和過程中形成複雜社會群體，以此作為對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回應。¹¹以上論述都是把區間文化交匯作為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主要推動力來對待的。

距今五千年前三大區間頻繁的文化交匯及其對各大區文明起源進程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中原區與東南區的東西交匯和中原區與東北區的南北交匯。這兩次交匯的形式和內容既各有特點，又具共同性。

東西交匯的導向，是先以仰韶文化以彩陶為主的文化因素對東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響為主，約從距今五千五百年後則文化交流的導向有所轉化，東方大汶口文化等加強了對中原地區的影響，後者的標誌是首先在靠近東南沿海區的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中，新出現的具東南區特徵性文化因素的鼎、豆、壺漸成為陶器的主要組合，有逐步替代當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器和小口尖底瓶之勢。如從中原區與東方區社會發展水平的比較看，大汶口文化在它的早期就已出現規格甚高的墓葬，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時，這種分化進一步發展，並且出現了像大汶口遺址、陵陽河遺址、花廳遺址那樣的中心聚落或墓地，特別是大汶口那樣的超中心聚落和墓地。¹²而仰韶文化是在其晚期時這類分化有較多顯現，如陝西省華縣泉護村隨葬大型陶鷹鼎的女性大墓，甘肅省秦安大地灣遺址「塢壁式」中心聚落和「宮

9 a 蘇秉琦，〈建國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頁302。

b 〈文化與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頁97-98。

10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頁189。

11 許倬雲，〈歷史分光鏡〉，頁196、252。

12 a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

b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

殿式」大房址，河南省靈寶鑄鼎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大型聚落群，¹³而尤以豫西地區表現較為突出，如出現了鄭州西山古城和大河村、王灣那樣的中心聚落，¹⁴表現為社會發展階段的變革後於東方一步和鄰近東南方的豫西地區先於其以西的關中地區。顯然，東南區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社會發展水平較快較高，是東西方交匯中東對西的影響大於西對東的影響的主要原因。¹⁵

南北交匯也是先以中原區後岡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對東北區南部紅山文化的影響為主，約距今五千五百年後，出現南北兩種文化的碰撞。前者的證據在於，紅山文化早期出現具後岡一期文化特徵的「紅頂碗」，此後，紅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進因素，特別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形成具有南北兩種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徵。後者的證據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張家口地區桑乾河上游壺流河流域的蔚縣西合營鄉三關村附近，發現的一群具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特徵的遺址中，也不時有篋點「之」字紋陶器等燕山以北地區紅山文化因素出現，特別是發掘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繪玫瑰花卉圖案彩陶盆與紅山文化繪龍鱗紋圖案彩陶垂腹罐在這裡有共存關係（圖2），表明紅山文化在它的晚期由大凌河流域向南擴展，並在桑乾河上游一帶與從華山腳下沿太行山西麓北上的仰韶文化相遇。¹⁶蘇秉琦並認為，遼西地區作為五千年古國象徵之一的紅山文化規模宏大的壇、廟、塚遺址群，就是這一南北文化碰撞產生的「文明火花」。¹⁷

如果說，距今五千年前三大區是在發展個性為主的前提下進行頻繁交匯的話，那麼到了距今五千年後，隨著這種文化交匯的進一步擴大，已使各大區具有了更多共同的時代特徵，進入了最初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時期。一方面由於以眾多城址出現為標誌的古國林立，區內文化的組合與重組加速，一方面大區文化交流集中表現為以東南區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東北南部、內蒙古中南

13 a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901號房址發掘簡報〉，頁1-15。

b 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頁51-82。

c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隊等，〈河南靈寶市北陽平遺址調查〉，頁1-15。

14 a 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鄭州西山仰韶時代城址的發掘〉，頁4-15。

b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遺址〉，頁330-336。

c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遺址發掘報告〉。

15 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頁51-82。

16 a 張家口考古隊，〈一九七九年蔚縣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收穫〉，頁97-105、150。

b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頁79-80。

c 蘇秉琦，〈中華文明的新曙光〉，頁80-85。

17 蘇秉琦，〈晉文化問題——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要點）〉，頁17-21。

部在內的燕山南北地區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東北和北方地區為一方，以東南地區為另一方在中原區彙聚的主流形勢，是為龍山時代出現的背景。典型實例見於東南區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內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區，中原區河南與晉南的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具有大中心下多中心和禮儀建築、玉禮器高度規範化兩大特徵，已顯現出向「方國」時代過渡的種種跡象。¹⁸ 內蒙古中南部則是被譽為「中華文化代表性化石」的三袋足器的發源地。¹⁹ 晉南陶寺遺址和墓地作為龍山文化的一個超中心聚落，既有與紅山文化彩陶龍鱗紋有關的飾朱繪龍鱗盤龍紋黑陶盤和具紅山文化玉器特徵的外方內圓的玉璧，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初期的袋足器——罍鬲，又有來自東南區大汶口文化的陶禮器和良渚文化的玉琮與俎刀，表現為多元文化的綜合體性質（圖3）。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陶寺墓地大型墓葬陶禮器的組合中，具大汶口文化特徵的陶器達十種之多。²⁰ 可見，東南區對中原區的文明起源進程，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並發揮影響。

將以上東西交匯與南北交匯作一比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這首先表現於交匯的後果。「仰韶時代」（後期）南北交匯在燕山以北產生的「壇、廟、塚」和東西交匯在豫西地區產生的「鼎、豆、壺」，無論是建築群還是陶器群，都組合固定，已具強烈的禮制性質。漸有學者認為，從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至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現，都是通神的工具，具「神器」性質，以它們作為距今五千年前後各大考古文化區出現古國和向方國過渡的標誌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國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與特點，那就是通神及其獨佔權（神權至上）在文明起源過程中佔有特殊重要地位。²¹ 三大區交匯的重要共同點還在於交匯的導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區向四鄰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區聚集。這在龍山時代晉南的陶寺遺址表現尤為典型。如果追尋在這場頻繁文化交匯中經常扮演活躍角色的諸文化因素的傳播蹤跡，如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彩陶，大汶口文化的鼎、豆、壺等陶器，紅山文化的玉雕龍和良渚文化的玉琮等玉器，以及這些活躍因素在諸文化中心聚落，特別是像陶寺遺址和該遺址中高層次墓葬出現頻率較高的情況分析，在文化交匯促成的文明起源過程中，還有禮器尤

18 郭大順，〈論聚落的層次性——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比較研究〉，頁61-66。

19 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頁49、50。

20 高燁，〈汾河灣旁磬和鼓——蘇秉琦先生關於陶寺考古的論述〉，頁666。

21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第一講。

其是神器的傳播優先，在中心聚落尤其是超中心聚落的表現的敏感性優於一般聚落，在高層次人物墓葬中的表現優於一般墓葬的共同規律。高煒並以爲，《禮記》所記「禮尚往來」（《禮記·曲記》）就是「禮器作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體現物」，在文化交匯中最爲活躍的真實記錄。²²

差異主要在於交融的程度有所不同。對此，蘇秉琦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從地圖上看，以關中、豫西、晉南爲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爲中心的紅山文化，兩者間距離要比關中同山東半島之間的距離遠好多，但從仰韶文化「玫瑰花」（彩陶圖案）的傳佈、影響看，前者比後者顯著很多，結果也不一樣，前者是融合在紅山文化中，成爲當地文化因素之一；後者則不然，僅是「外來品」而已，並沒落地生根。所以，仰韶與紅山可以比作兄弟，而仰韶與大汶口僅是近鄰而已。」²³ 聯繫大汶口文化以鼎、豆、壺爲代表的陶禮器的演變，在既具很強連續性的同時，又具很強的階段性的特點，可知，在這場頻繁的文化交匯導致文明形成的過程中，東南區的大汶口文化主要是以自身內部動力爲主跨進文明階段的。而它對周圍地區的廣泛影響說明，東方的大汶口文化等，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曾經起過「原動力」的作用。²⁴

還要提到的是，在這場既推進跨入文明步伐又促成文化共同體形成的交匯中，南北文化的交流形式和內容，似更具典型性。這指的是，在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之間的關係中，表現出的是兩種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結合，其後果卻不是文化間的替代甚至衝突，也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更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主要表現爲紅山文化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區仰韶文化以彩陶爲主的先進文化因素的同時，不斷創造出自身新的文化特徵，如彩陶龍鱗紋。其最大的成功之處，尤其表現爲中華傳統的初現：東山嘴、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壇的平面圖前部像北京天壇的圓丘，後部像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方基；廟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質鑲嵌與我國傳統彩塑技法一致；塚的結構與後世帝王陵墓相似；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自然聯想到我們今天的自稱「華人」和「龍的傳人」。發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間的歷史轉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個奇跡。」²⁵

22 高煒在《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紀要〉，頁544-546。

23 蘇秉琦，〈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代序言）〉，頁40-41。

24 郭大順，〈大汶口文化陶器禮器化進程及其意義〉，頁91-107。

25 蘇秉琦，〈象徵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頁91-93。

三、從考古文化區系研究到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

以上可以作為我對中華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過程總格局的一個概括性認識。這一認識雖然是近年才逐步形成的，卻經過了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

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新石器考古課，印象比較深的一個概念是「混合文化」。這一文化現象在兩個地帶有突出表現，一是在北方的長城地帶，一是中原的河南省西部地區。三、四十年代在長城地帶北沿發現的錦西沙鍋屯和赤峰紅山後這兩處遺址，石器和陶器都有南北兩種文化因素共出的現象，梁思永、尹達、裴文中諸先生都曾關注過其中所反映出的長城南北史前文化接觸的問題。裴文中先生就以爲，這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南下，與仰韶文化北上，在長城地帶接觸而產生的混合文化。²⁶ 在中原地區，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1921年發掘仰韶村遺址，是把有紅陶彩陶與黑陶共出現象的仰韶村遺址作為「一種以非常豐富多樣的陶器爲特徵的單一的文化期」，²⁷ 梁思永先生以爲那是東部龍山文化與西部仰韶文化接觸產生的「混合」現象。²⁸ 此後雖將其中屬於龍山文化的遺存分辨出來，但五十年代初，夏鼐先生在河南省廣武點軍台遺址和澠池仰韶村遺址發掘，仍然又找到了紅陶、彩陶與黑陶共出於同一地層和灰坑的現象，遂認爲河南西部確有一種「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²⁹ 1960年和1962年，我分別參加了在洛陽王灣遺址的生產實習和專題實習，真的看到了「混合文化」：在晚於仰韶文化層和早於龍山文化層的若干地層和灰坑單位中，反覆出現彩陶、紅陶的鉢盆類與灰陶和黑陶的鼎、豆、壺類共出的現象，還有在灰黑陶器上繪紅彩的彩陶器，且有紅陶、彩陶逐步減少，黑灰陶逐漸增加和鼎、豆、壺等器類明確的早晚演變序列（圖4），當時考慮較多的，是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的過渡，所以又稱具這種現象的文化遺存爲「過渡期」（即王灣二期文化）。³⁰ 記得那時蘇秉琦先生曾來洛陽指導實習，他摸了王灣遺址的陶片後說了一句：「四面八方」，當時似懂非懂。1964年我的研

26 a 梁思永，〈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頁38、40頁。

b 裴文中，〈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尹達，〈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頁143-146。

27 J. G. 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 in Honan," 1-124.

28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頁97。

29 a 夏鼐，〈河南澠池的史前遺址〉，頁341。

b 夏鼐，〈河南成武廣武區考古紀略〉，頁348。

30 a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洛陽王灣遺址發掘簡報〉，頁175-178。

b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究生實習安排在東南沿海地區，先在濟南整理大汶口遺址那134座墓葬出土陶器，後又到蘇南浙北觀摩學習崧澤、邱城、良渚等遺址或出土文物。印象較深的是，鼎、豆一類三足器和圈足器似在東南一帶出現較早。1965年，蘇秉琦先生在《考古學報》上發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文中在理清中原仰韶文化和東方大汶口文化的階段劃分、發展序列之後，分階段對各自的主要文化因素進行了對比，提出：西部的仰韶文化與東方的大汶口文化發展大體同步，互有影響，而東方對西方的影響大於西方對東方的影響，其原因在於，東方大汶口諸文化社會發展階段高於西部仰韶文化，豫西王灣等遺址仰韶文化後期逐步以鼎、豆、壺替代彩陶和小口尖底瓶的情況，就是東方大汶口諸文化對西部仰韶文化影響較大的反映。雖然當時由於早於龍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東、西部新石器文化的比較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年代序列基礎上，即東、西方的關係不是過去以爲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關係，而是仰韶文化與東方早於龍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關係，但在當時歷史考古學界以中原爲中心的傳統史學觀點占主流地位的情況下，蘇先生的觀點既具有很強的預見性，又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如從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形成過程看，那時這一理論還處在醞釀階段，就已觸及到考古文化區與區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變革這些較爲深層次的課題。而且在學校考古教學中已有了以這一理論指導的教學活動，我有幸成爲受益者。選擇王灣遺址和大汶口墓地這樣既完整又在史前考古文化區間交匯中具典型性的材料作爲實習對象，使我受益無窮。

七十年代我由學校到遼寧工作，先接觸到喀左縣的窖藏商周青銅器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直覺是，它們既包含有大量中原或近於中原的因素，又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地域性，時代與中原地區有關遺存也應是同步或大體同步的。以後隨著遼西以及遼東等地區考古文化序列的逐步建立，當地自身文化發展的脈絡越來越清晰，與中原和周鄰地區文化發展的同步性也更爲明確，遂成爲實踐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一個重點地區，所以對於八十年代中期以龍形玉爲代表的紅山文化玉器的確認和牛河梁規模巨大的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遺址群的發現，我們並不感到意外，並據此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問題，但對紅山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這一飛躍現象後面有何重大歷史背景，卻有些迷茫。1985年，蘇秉琦先生在提出以紅山文化爲主要內容的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同時，以爲，紅山文化「壇廟塚」和玉器群的出現，是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南北接觸產生的後果。半個世紀前因紅山文化的發現而注意到長城南北文化的接觸，現在再一次提出，完全

賦予新意。蘇先生十分重視這一南北關係在中國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在具體論述了這一南北關係的路線、對接點、交匯形式與後果之後強調：「當仰韶與紅山一旦結合起來，中國文化史面貌為之一新。」³¹當時也曾聯想到中原區與東南沿海區之間的文化交匯，在豫西地區也應有高於洛陽王灣和鄭州大河村那樣中心聚落的後果，可喜的是，這一成果已不斷有所顯現，其中的典型實證，一是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發現，一是陶寺墓地的發現。西山古城出土陶器近於王灣二期文化，陶寺大墓中隨葬成組合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式陶器，更有良渚文化玉琮和石俎刀隨葬，它們都應是東西文化交匯在距今五千年前後，分別在豫西、晉南地區所產生的社會發展階段飛躍的突出代表。自從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正式提出以來，各地在建立自身文化序列的同時，都在探尋當地文明起源的進程，而中原、東南沿海及東北南部這三大區有關文明起源的典型例證，都與文化交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可知，由考古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引伸出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既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史上一個必然的發展過程，而對區間文化交匯的研究則起到連接這兩個重大研究階段的紐帶作用。

四、舉足輕重的東北文化區

對大區文化交匯更深一步的理解是從我對東北文化區的認識開始的。根據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在中國諸考古文化區系中，有一個東北文化區。不過，我雖一直在東北從事考古工作，但對東北文化區的認識在很長時間裡是相當模糊的。前述1993年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藝術博物館開館舉辦的「迎接二十一世紀的考古學」國際學術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文化交匯與中國早期國家〉中，提出以考古文化特徵劃分包括東北區在內的三大區，並未能觸及東北文化區的一些實質問題，如東北文化區特有的漁獵經濟，紅山文化是否屬於東北文化區等，尤其是尚未意識到北方區與東北區的區別。認真思考並在觀念上有所突破是從討論查海—興隆窪文化經濟生活開始的。一般都強調查海、興隆窪這類遺存，應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日本學者秋山進午等學者堅持遼西地區這類較早新石器文化，其主要經濟活動是採集和漁獵，他們主要是從陶器上看到查海、興隆窪這類遺存

31 蘇秉琦，〈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代序言）〉，頁41。

飾壓印紋夾砂筒形罐，與日本列島繩紋文化陶器基本特徵是相近的，而繩紋文化長期保持著採集、漁獵文化的本色。³² 蘇秉琦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有關部分也提出查海—興隆窪文化已有農業，但並不占主要地位，採集狩獵仍是主要經濟活動；³³ 在這期間，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正在進行一個以《東北亞考古學研究》為題的合作研究專案，使我們有機會看到日本一些典型的繩紋時代遺址並有興趣翻閱一些有關資料，尤其是1995年對日本北陸和東北地區的考察，發現主要在日本北部的繩紋時代有一些大型甚至特大型的聚落遺址和祭祀遺址，都是以發達的漁獵經濟為基礎形成的，如著名的青森縣山內丸遺址。看來漁獵經濟也能維持大型聚落並可能跨進文明社會。³⁴ 特別是蘇秉琦先生在他晚年的論著和談話中，已將東北文化區從燕山南北地區中有所區分，並多次以滿族開國史為例，強調漁獵文化的優勢，³⁵ 這些都引起了我的重新思索。圍繞著東北文化區與紅山文化的關係，主要有以下新認識：

（一）在以燕山南北地區為重心的北方區系中將北方區與東北區予以區分

其主要區別在於：在考古文化特徵上，東北文化區以筒形罐及其演變為最主要特徵，而包括冀北、晉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北方文化區則筒形罐僅在廟子溝等個別考古文化中出現，一般認為，那是與東北文化區交流的結果；³⁶ 在文化關係上，包括遼西區在內的東北文化區未有典型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發現，而是將這些文化因素融於當地文化之中，並成為自身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冀北、晉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則為典型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與當地文化的共存與交錯，更多表現為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隨環境變化和文化強弱而彼此進退的形勢。³⁷ 在經濟類型上，東北文化區以漁獵經濟為主，北方文化區則主要為游牧經濟。以上雖主要指的是史前時期東北與北方的地域差別，到

32 秋山進午，〈紅山文化と先紅山文化——赤峰紅山考古、其の一〉，頁2-26。

33 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頁353-354。

34 a 郭大順，〈玉之路和繩紋人的文明信息——日本北陸、東北地區文物考察〉，頁211-216。

b 安田喜憲，〈從地理環境和氣候變動看文明的誕生〉，頁17-26。

35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頁136-139。

36 魏堅、曹建恩，〈廟子溝文化筒形罐及相關問題〉，頁101-109。

37 田廣金、史培軍，〈內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環境考古研究〉，頁119-132。

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隨著南北、東西文化的交流，農耕、畜牧業在東北文化區的南部和西部有所發展，北方區與東北區的差別在縮小，但地域特徵的主導作用仍不時顯現，對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主要考古文化特徵的分析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二）包括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在內的遼西區屬於東北文化區

紅山文化雖具有飾壓印紋砂質灰褐陶筒形罐與泥質紅陶和彩陶共存，磨製石器與打製石器和細石器共存，農牧漁獵多種經濟共存的文化內涵，但具自身文化特色的，是飾壓印紋筒形罐、細石器以至玉器的發達，這些都是東北區新石器時代的主要區域文化特點；夏家店下層文化雖已具有更多近於龍山時代和夏商文化的特徵，如已擁有發達的鋤耕農業，三袋足器突然興起，近於二里頭文化的鬻、爵形制與組合，以饕餮紋為主要題材、酷似商代青銅器圖案的彩繪花紋等，但該文化仍強烈地表現著東北文化的區域性特色，如夏家店下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筒形鬲已有源於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筒形罐的可信線索，並將這一傳統地域文化特徵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燕國特有的「燕式鬲」（圖5）。³⁸

對赤峰地區史前到青銅時代的環境考古學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赤峰地區現今雖為典型草原景觀，但在距今三千年左右的青銅時代，為森林草原區，而向前追溯到距今八千至六千年前，則為暖溫性夏綠闊葉林區，當時的自然生態與東北區是一致的。³⁹

由於遼西區長期以來與中原文化區同步發展，有時甚至「先走一步」，如果遼西區屬於東北文化區，則對東北區的文化與文明發展水平就應重新估價。

38 蘇秉琦先生說：「燕下都及北京所出燕國文物，包括瓦當，也發現於昭盟和朝陽等地，其範圍大致和歷史地圖中戰國時期燕國國境相符，燕瓦當之外還有「燕式鬲」。絕妙的是這種鬲的結構（袋式器體）恰恰同夏家店下層文化晚期鬲似乎一脈相承。」〈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頁2-5、15；劉觀民、劉晉祥在〈蘇秉琦先生與大甸子〉一文中說：「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鬲，是迄今所知內蒙古長城地帶東段最先見到的空足三足器。分析這種文化中A形鬲的形態，宜是在當地傳統的直筒形罐的腹腔上加侈唇敞口，腹腔下安裝三個併合在一起的空足。形態中明顯地保留著土著傳統的直筒形腹腔」。《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頁140。

39 a 孔昭宸、杜乃秋、劉觀民、楊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間環境考古學的初步研究〉，頁323-333。

b 徐光冀，〈富河文化的發現與研究〉，頁179。

c 趙志軍，〈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新線索〉，《中國文物報》。

（三）對東北文化區發展水平的重新估價，首先是對漁獵文化作用的重新認識

一般以為，漁獵文化被農業所替代是從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標誌，所以，新石器時代以後仍然保持的漁獵文化被視為較農業文化為後進的文化。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特別是在史前文化發展進程中，漁獵文化一直與農業並存，而在東北文化區的新石器時代以至青銅時代，漁獵經濟甚至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與農耕文化相比，漁獵文化雖因對自然界依賴性大、生活來源不穩定而逐步為農耕文化所替代，但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某些自身優勢，如對舊石器時代上百萬年文化經驗的直接延續，漁獵人與大自然和諧的本色卻是農耕文化不能比擬的。表現在文化關係方面，漁獵人雖也具有產生定居生活的條件，但隨動物群而流動仍然是主要生活方式，這同農耕文化固守本土的習俗也有很大的不同，從而培養出開放而不封閉的文化心態，突出表現為對各種文化，特別是不同經濟類型、不同文化傳統的諸文化先進因素的吸收和融於自身的能力，從而在適合的條件下，在與先進文化接觸的過程中，就會產生文化上的突變。紅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來自中原區包括彩陶在內的先進文化因素，並將其融於本文化之中，成為自身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在特定的條件下，因文化交匯而產生社會飛躍，就是很好的例證。紅山文化的發展是以廣闊的東北文化區為其大背景的，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南北交匯，是中原區與東北區兩大文化區之間的交匯，紅山文化的飛躍，是東北漁獵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結合的碩果。

五、三大區交匯展現五帝時代圖景

由於對東北文化區的這一重新定位，中原、東南、東北三大文化區鼎立及其間的文化交匯，成為我認識中華文明起源的基本思路。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都曾依古史傳說提出過史前三大集團的劃分及相互關係，指中原華夏（河洛）、東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蠻族（江漢）。⁴⁰六十年代蘇秉琦先生在研究中原區與東南區文化關係時，從考古文化方面提出過中原地區後期仰韶文化、魯南蘇北青蓮崗——大汶口諸文化和

40 a 蒙文通《古史甄微》。

b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江漢間屈家嶺文化三個文化區的劃分及相互關係，以為是受到此前史學家們的啓發。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蘇先生在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時，在繼續關注中原區、東南區的同時，更重視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他並回憶到梁思永先生也有自己的三集團說。⁴¹如追溯梁思永從三十年代在原熱河省調查發掘時，就重視「沿邊文化接觸區域」的紅山文化和「長城南北幾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系統的相對的時代關係確定之後，我們才能腳踏實地的去作對比上古史與考古學發現的工作」的思考推測，梁先生的三集團說也可能包括了東北地區南部。⁴²田昌五先生則有四集團說，大致是在原三集團說的基礎上增加了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區。⁴³筆者在多年學習和實踐中一直追隨並領會諸位先輩的真知灼見，不斷有所心得。現在試就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進一步將擁有紅山文化的東北文化區從廣義的北方區中加以區分，作為一個在距今五千年前後中華大地上與中原區、東南區三足鼎立的獨立的古文化區對待，以此「三集團」作為古史傳說與史前考古的結合點，得出的新認識是：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區系、以距今五千年為界的兩大發展階段和各區各段先後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的頻繁交匯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東而西的移動趨勢，反映出中國文明起源和從古國逐步向方國過渡的一些主要軌跡。饒有興味的是，這一軌跡恰與古史傳說以黃帝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前期，北方、中原、東方和南方接觸頻繁，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時代後期，由四鄰向中原彙聚的記載相吻合。前者如《史記·五帝本紀》所記：「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即是五帝時代前期時代交替與新的時代部落集團頻繁交流的真實而概括的寫照；後者如《孟子》所記：「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孟子·離婁章句下》）所以舜繼堯位要「之」中國：「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萬章章句上》）。可知，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就是五帝時代。五帝時代不僅包括龍山時代，其早期應上溯到仰韶時代（晚期）。當然，五帝時代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動中心也應從更大範圍進行考察。許倬雲先生在他的新著《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一書中也表達了相近的

41 蘇秉琦，〈山東史前考古〉，頁42。

42 梁思永，〈熱河查不幹廟等處所採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頁144。

43 田昌五，〈古代社會斷代新論〉，頁35-62。

觀點（圖6、7）。⁴⁴

以上認識還可進一步歸納為以下三點：

- (1) 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文化之間的交流，有一個由接觸、碰撞到交流、吸收、融合的艱難而曲折的過程，需要經過反復的組合與重組，而一旦成功，則維繫力極強，且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關係即是。
- (2) 由文化交匯促成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是文化走向一統的過程，同時還是中華傳統初現的過程。文明起源、文化一統與傳統初現三者是並進而互動的。
- (3) 文化認同優先，且是不間斷的，並起到促進政治上統一的作用。分佈於中華大地廣袤地域諸多群體，在各自發展個性的同時，不是分道揚鑣，而是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匯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實現「共識的中國」，從而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現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形成奠了基。

距今五千年作為中國文明史的開端，對以後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影響深遠至今，特別是在世界諸文明古國中，唯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由此可作進一步理解。

可見，文明起源的研究，並不限於對文明概念的理解，文明標誌的界定，也不限於文明誕生的具體時間，而有其更為深刻的歷史文化內含有待開掘。看來，從上個世紀初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起就已開啓的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經歷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熱烈討論和社會關注，仍方興未艾，正展現出更為廣闊的前景。繼續把它作為跨入新世紀以後歷史考古學科研究的重點課題堅持並不斷深入下去，已是必然趨勢。

⁴⁴ a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頁79、80。

b 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頁27。

c 郭大順，〈追尋五帝〉。

引用書目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隊等，〈河南靈寶市北陽平遺址調查〉，《考古》，1999年第12期，頁1-1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 尹達，〈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新石器時代》，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55，頁143-146。
- 孔昭宸、杜乃秋、劉觀民、楊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間環境考古學的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附錄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323-333。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洛陽王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4期，頁175-178。
-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901號房址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2期，頁1-15。
- 田昌五，《古代社會斷代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田廣金、史培軍，〈內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環境考古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頁119-132。
- 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安田喜憲，〈從地理環境和氣候變動看文明的誕生〉，高崇文、安田喜憲主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17-26。
- 西安半坡博物館編，《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林沄，《林沄學術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
- 夏鼐，〈河南成臯廣武區考古紀略〉，《夏鼐文集·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44-350。
- 夏鼐，〈河南澠池的史前遺址〉，《夏鼐文集·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36-343。

- 徐光冀，〈富河文化的發現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76-180。
-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
- 高煒，〈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紀要〉（1991年11月27-30日），《考古》，1992年第6期，頁544-546。
- 高煒、張岱海，〈汾河灣旁磬和鼓——蘇秉琦先生關於陶寺考古的論述〉，《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654-670。
- 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鄭州西山仰韶時代城址的發掘〉，《文物》，1999年第7期，頁4-15。
-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99，頁151-189。
- 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過渡〉，《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頁1-44。
- 張家口考古隊，〈一九七九年蔚縣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收穫〉，《考古》，1981年第2期，頁97-105、150。
-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91-98。
- 梁思永，〈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1-49。
- 梁思永，〈熱河查不幹廟等處所採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107-144。
- 許倬雲，《歷史分光鏡》，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 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 郭大順，〈文化交匯與中國早期國家〉（未發表），北京大學「迎接21世紀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3。
- 郭大順，〈玉之路和繩紋人的文明信息——日本北陸、東北地區文物考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中國考古學研究會編，《東北亞考古學研究——中日合作研究報告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211-216。
- 郭大順，〈論聚落的層次性——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比較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61-66。
- 郭大順，《追尋五帝》，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0。
- 郭大順，〈大汶口文化陶器禮器化進程及其意義〉，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一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91-107。

- 馮恩學，〈東北平底筒形罐區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4期，頁28-42。
- 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裴文中，《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趙志軍，〈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新線索〉，《中國文物報》，2004年11月12日，第7版。
- 劉觀民、劉晉祥，〈蘇秉琦先生與大甸子〉，《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36-145。
-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遺址〉，《考古》1973年第6期，頁330-336。
- 鄧淑蘋，〈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1995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辦中國古玉研討會論文》，《中華文化學會》，1995年年刊，頁44-58。“A Theory of the Three Origins of Jad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Rosemary E. Scott, *Chinese Jades,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18,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9-25.
- 魏堅、曹建恩，〈廟子溝文化筒形罐及相關問題〉，《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論文集》，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頁101-109。
- 嚴文明，《龍山文化與龍山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頁41-48。
-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提要）〉，《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頁17-18。
- 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頁51-82。
- 蘇秉琦，〈建國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299-305。
- 蘇秉琦，〈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創刊號，頁2-5、15。
-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國建設》，1987年第9期，頁79-80。
- 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文物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44-54。
- 蘇秉琦，〈山東史前考古〉，《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42-44。
- 蘇秉琦，〈中華文明的新曙光〉，《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80-85。
- 蘇秉琦，〈文化與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94-99。
- 蘇秉琦，〈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代序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35-41。
- 蘇秉琦，〈再談籌建考古實驗站與課題問題——給山東省文物局負責人的一封信〉，《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170-172。

- 蘇秉琦，〈晉文化問題——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要點）〉，《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17-21。
- 蘇秉琦，〈象徵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頁91-93。
-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7。
- 甲元真之，〈長江と黄河——中國初期農耕文化的の比較研究〉，《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92年40期，頁108-114。
- 岡村秀典，〈農耕社會と文明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98。譯文見《華夏考古》，2001年1期，頁85-97。
- 秋山進午，〈東北地區の新石器文化〉，《世界の大遺跡・9・古代中國の遺産》，東京：講談社，1988，頁34-35。
- 秋山進午，〈紅山文化と先紅山文化——赤峰紅山考古、其の一〉，《古史春秋》1989年第五號，京都：朋友書店，頁2-26。
- 秋山進午，〈阜新查海遺址與遺址博物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中國考古學研究會編，《東北亞考古學研究——中日合作研究報告書》，文物出版社，1997，頁334-343。
- Andersson, J. G.. "Prehistoric Site in Honan."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9 (1947): 1-124.

The Intermingling of the Three Major Prehistoric Cultural Region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uo Dashun

Director Emeritus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Intermingling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regions was one of the forces driving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were North-South and East-West intermingling between the millet-growing central plains, which used painted pottery and the pointed-bottom jar; the rice-growing Southeast, which used tripod *ting*, stemmed-plate *tou*, and pot-shaped *hu* vessels; and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Northeast which used cylindrical jars. These cultures can also be divided chronologically into two periods with the cusp at approximately 3000 B.C.: the Yang-shao period, which featured the formation of each region's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 interregional contact; and the Lung-shan period, which witnessed the early formation of a common cultural complex. The altar (*tan*), temple (*miao*), and tomb mound (*chung*) complex, created by North-South intermingling north of Yen Mountain, and the *ting*, *tou*, and *hu* vessel complex, created by East-West intermingling in western Honan, both featured characteristics of a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The route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that they reflected, leading from Yen Mountain and the Southeast coast towar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at they realized, parallel the tracks of legendary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era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y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Hsia,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The Three Regions, cultural mingling,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era of the Five Emper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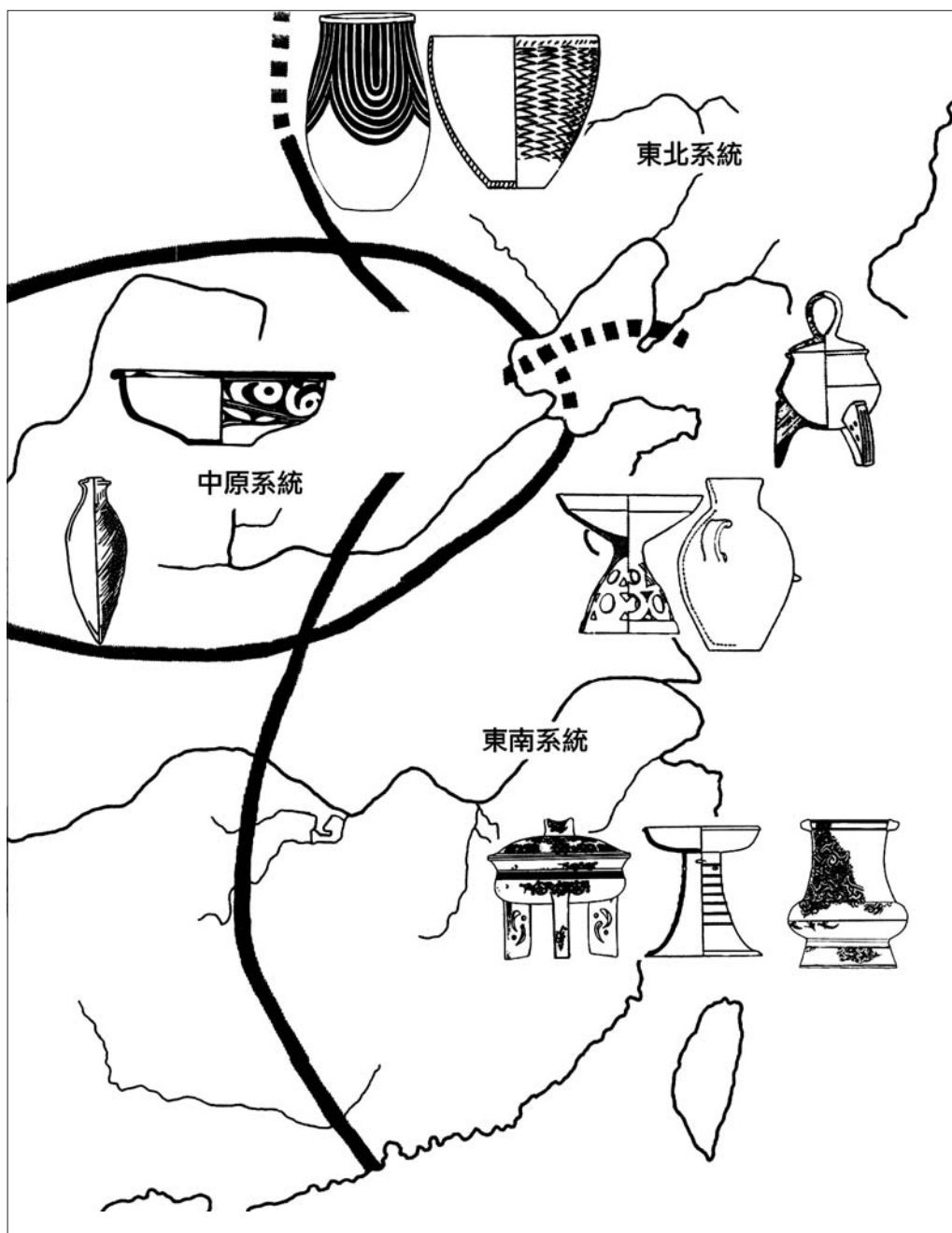


圖1 史前三大考古文化區及主要考古文化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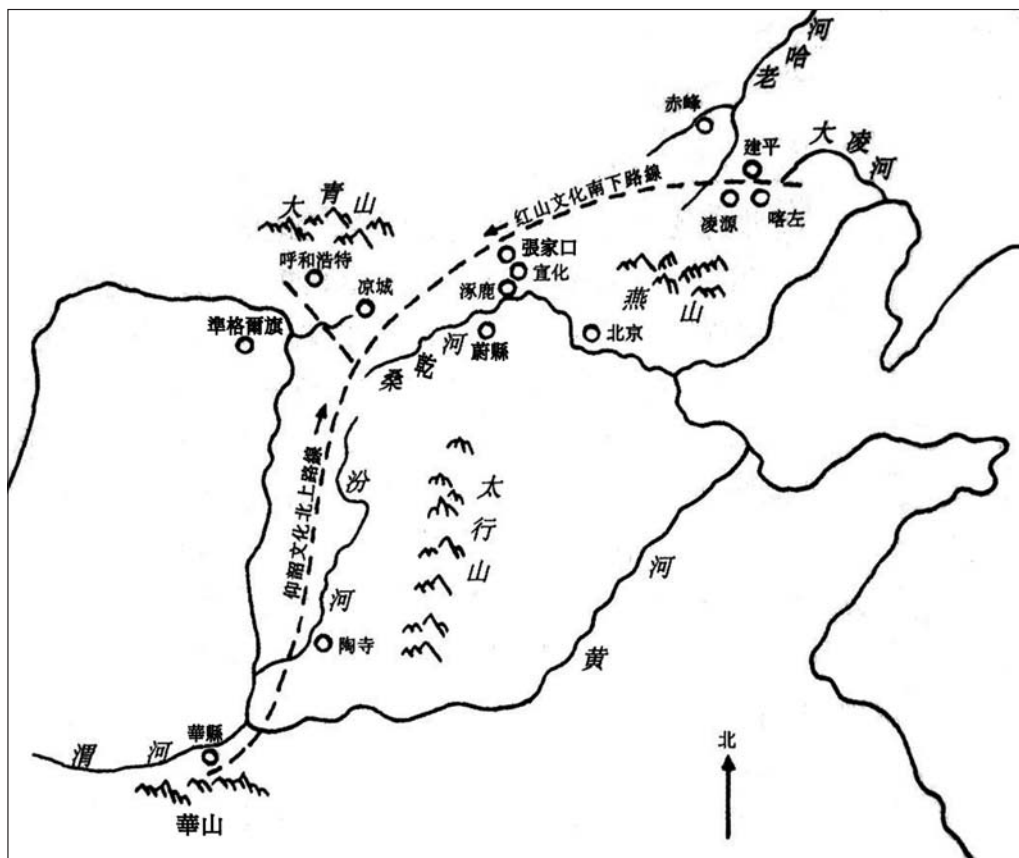


圖2-1 紅山文化南下與仰韶文化北上在桑乾河上游交匯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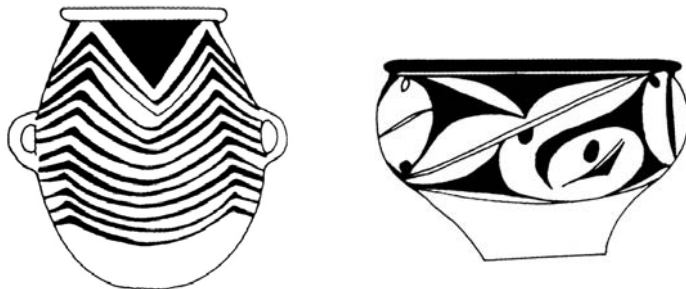


圖2-2 河北省蔚縣三關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具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盆與具紅山文化的鱗紋彩陶垂腹罐共存 摘自《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頁400，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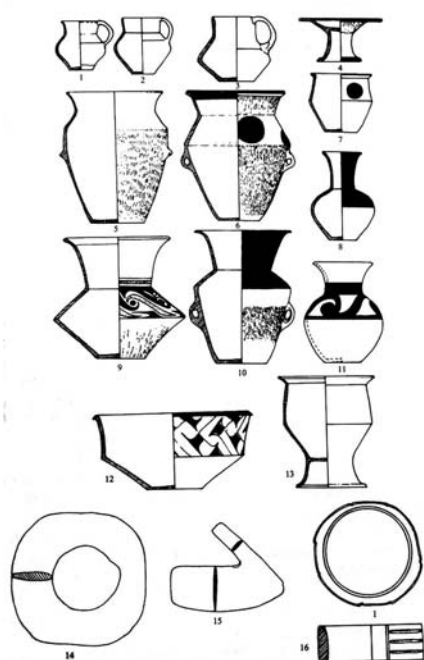


圖3 陶寺墓葬隨葬品具南北文化綜合體性質
摘自《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頁401，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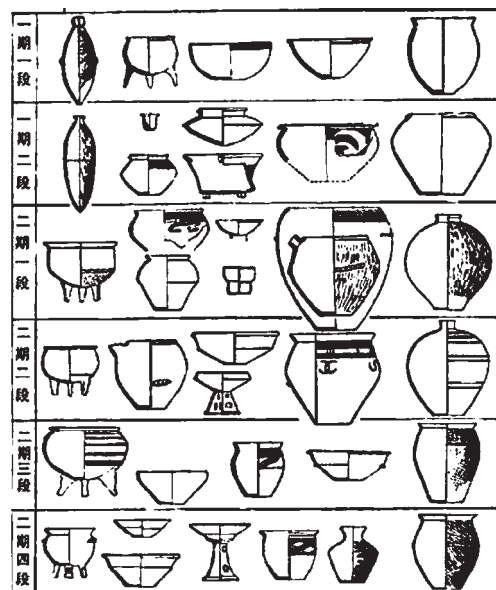


圖4 洛陽王灣新石器時代遺址一、二期陶器演變圖
摘自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一輯，頁100，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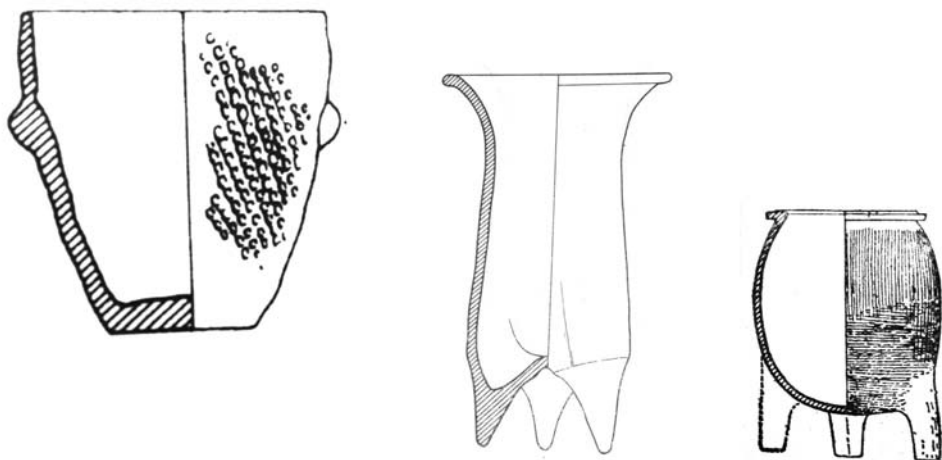


圖5 新石器時代筒形罐 夏家店下層文化與燕文化的陶甬 分別摘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編著，《大南溝——後紅山文化墓地發掘報告》，頁30，圖三〇，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頁78，圖三八，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燕下都，上》，頁224，圖一三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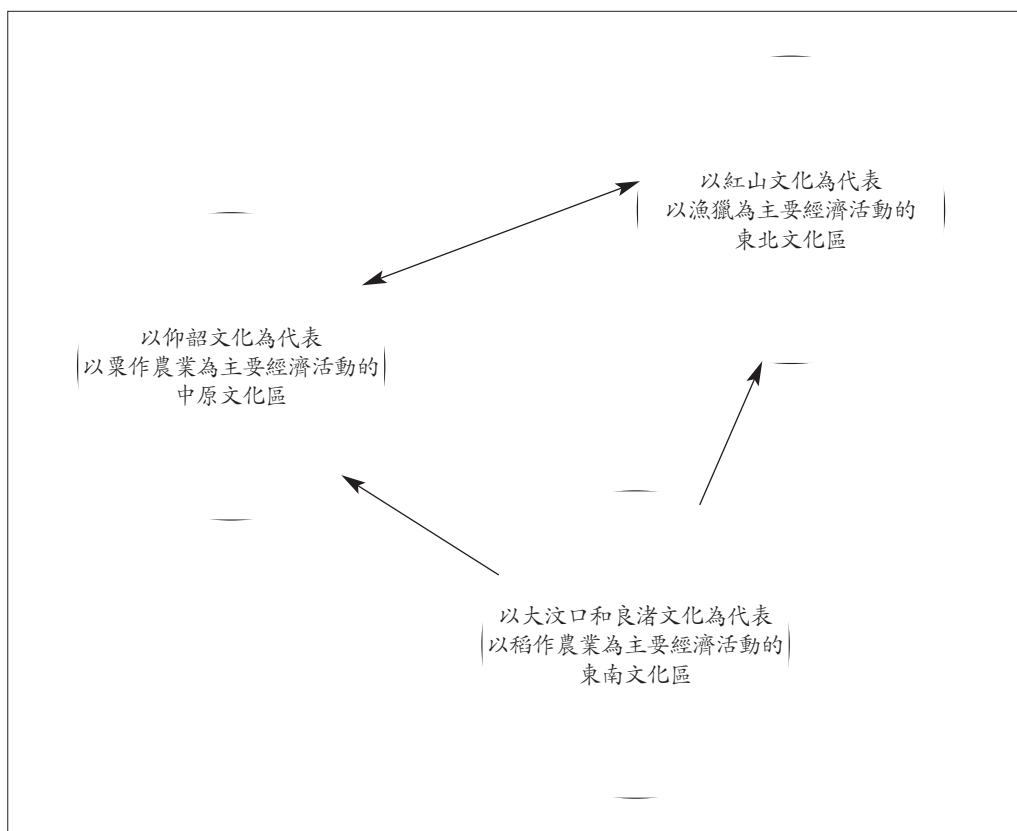


圖6 三集團文化互動及主導方向示意圖1 摘自《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頁395，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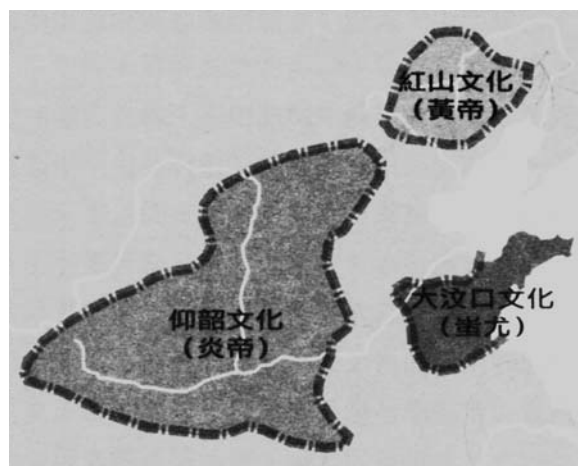


圖7 三集團文化互動及主導方向示意圖2 摘自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頁27。